

党内教育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历史出场、 拓新发展及时代价值

靳小勇

【内容提要】党内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人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和宝贵经验。1921年党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以党内教育主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党内教育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完成了其历史出场。新中国成立后，党内教育固本拓新，助力党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探索了制度化、常态化和长效化等新路径推动党的自我革命体制机制形成。在新时代，党内教育之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建立和健全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革命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党内集中教育 自我革命 中国共产党

作者简介：靳小勇（1986-），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陕西西安 710049）。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①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能够找到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其中善用党内教育进行自我革命功不可没。系统考察党内教育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历史出场、拓新发展及时代价值，对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党内教育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历史出场

习近平指出：“在全党开展集中性学习教育，是我们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也是一条重要经验。”^②百年党史中，党内教育既包括党中央、军党委以会议凝聚政治共识、统一党内路线政策的斗争或教育，更涵盖党中央发起的全党范围内的整风、整党、主题或专题集中教育活动。历史地看，虽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尚未明确提出自我革命的概念，其时的党内教育实践却已蕴含了自我革命的精神、决心和意志，把中国共产党锻造成为中国革命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也宣告了党自我革命的历史出场。

1. 党内教育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党员，提高自身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革命实践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重视通过党内教育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以指导革命，这是党提高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70页。

^②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0页。

自身的自觉精神的体现。在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党即提出了党员党性锻炼和政治历练的命题，党的二大指出：“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①。这表明党中央意识到革命的组织与训练极端重要，只有严肃党内的政治生活，才能切实推进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运动。为此，党中央设立教育宣传委员会负责“研究并实行团体以内之政治上的主义上的教育工作以及团体以外之宣传鼓动”^②。随着党内教育机构和制度的健全，全国性的政治宣传和教育被提上议事日程。1924年12月，党史上第一所地方党校——安源地委党校成立，以高级班、初级班对工人和学生中的党员、团员开展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并普及党的基本知识。这是党中央有序开展党内教育，锻造一支理论素养与革命经验兼备的干部队伍的初步尝试。

然而，革命的组织与训练是一项理论与实践特性兼具的长期任务，短期内党内教育举措的出台并没有改变其薄弱的现状，尤其是党员对组织的了解不够，对纪律与党纲的认知不到位、党员的训练也异常缺乏^③。为此，党内教育系统化被提上议事日程，党的四大要求集中力量办好《新青年》《中国工人》《党报》，编译小册子，设立党校、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会，以便系统地教育党员^④。根据早期党史资料显示，从1925年下半年到1926年间，北方区委党校、江浙区委党校、湖南区委党校、广东区委党校纷纷成立，以党校为依托训练高级干部，以部委训练班培训基层党员干部，以支部训练班培训全体党员^⑤。通过讲授马克思主义概论、经济学、阶级斗争史、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等内容，党校培养了一定数量的革命干部人才，提升了党的干部和全体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工农运动对革命人才的迫切需求，以及党自我提升的迫切要求，实现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一个大的群众党”的建党目标。

2. 党内教育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主动净化自身、完善自身的历史实践

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历程中，党内教育助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建军原则确立，即落实土地革命中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原则，彰显了党主动净化自我、完善自我的精神品格。

大革命失败将工农武装建设匮乏的问题暴露无遗，在革命危急关头，党中央通过八七会议凝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政治共识，这是党通过临时会议开展党内教育以转变指导思想的典型范例。在中国革命中心转入农村后，随着党员队伍及其所领导的武装力量成分日益复杂，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面临巨大的挑战。1928年我们党提出“加紧党内的政治教育，提高党的理论”^⑥时，以农民、旧式军人和小资产阶级为主的红四军队伍中，党内个人领导、小团体主义和极端民主化思想等多元化的思想盛行，极大地削弱了红四军党组织的作用。对此，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⑦为此，《古田会议决议》作出了“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⑧的部署。红四军党组织创造性地利用政治分析、组织常识、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90页。

②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555页。

③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62、266页。

④ 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56-257页。

⑤ 参见《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史志》编委会编：《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史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66页。

⑥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20页。

⑦ 《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4页。

⑧ 《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4页。

群众工作的策略和技术等材料，通过党报、谈话、批评、小组会和支部大会等方式，对党内的八种错误思想倾向进行了分析纠正，肃清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偏向。根据红四军军委代理书记熊寿祺 1930 年 4 月的报告，古田会议后红四军党内“努力同这八个错误倾向〔向〕奋斗，现在已有相当成绩。最显著的是单纯军事观点与极端民主化倾向两种的减少”^①。通过这一系列教育举措，红四军党内的极端民主化等观点逐一被克服，党内教育的净化举措有效地提升了红四军队伍思想上的统一性和纯洁性，实现了思想建党的整训目标。

政治建军原则能够在土地革命战争严酷的斗争中确立下来，也正是得益于成功的党内教育。习近平指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②这一特质和优势的形成，是在严酷的战争年代历经激烈的党内论争，通过党内教育奠定生成的。

八一南昌起义后党之于军队的领导体制上的不明晰，使党中央意识到政治指导集中于党是非常重要的^③。为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在三湾对部队进行整顿缩编，提出党支部建在连上，班上、排上有小组，在前委会议上，毛泽东以叶挺独立团为例说服会议上的种种质疑，教育党内的不同意见，建立健全“前委-党委-支部”的垂直领导架构，提出一切重大的决策必须由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一方案消除了南昌起义以来党对军队领导乏力的弊端，弥补了党对军队指挥权不明确、不集中的漏洞，加强并完善了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

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关系，但巩固、实现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通过党内教育来进一步凝聚共识。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之时，红四军党内前委与军委职责分工的争论愈演愈烈。中央政治局明确提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④后，纠正了红四军“七大”削弱前委权力、助长极端民主化的错误倾向。古田会议严肃批评了忽视红军思想政治工作和将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对立起来的错误观念，会议决议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提出通过党内教育“努力去改造党的组织，务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⑤。这表明，古田会议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建军原则逐步扎根于人民军队建设中，形成了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军政首长分工负责制。政治建军的原则经由古田会议确立后向全军推广，虽然在之后有新的创造和发展，但在基本上还是继承了《古田会议决议》的路线^⑥。

3. 党内教育的出场，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整顿党的学风、党风和文风，统一思想以革新自我的系统实践

历史地看，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克敌制胜的宝贵经验。全民族抗战打响后，面对党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上的不同主张，以及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所制造的政治军事摩擦，“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探索党内教育新形式以革新自我的全新命题。

“巩固党的中心一环，就是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阶级教育与党的教育”^⑦。为实现这一目标，党中央通过审查干部、整理支部和健全领导，从组织上巩固党。皖南事变使新四军遭受

① 古田会议纪念馆编：《古田会议文献资料》，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第516页。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页。

③ 参见邹运、单志浩：《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军原则的探索与实践》，《人民论坛》2021年第31期。

④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20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9、81、88页。

⑥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页。

⑦ 《王稼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20页。

惨重损失，使毛泽东深感有必要开展党内教育反对只知联合而不知斗争的抗战路线，以提升全党干部理论联系实际以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能力^①。1941年5月起，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陆续展开。中央层面的整风前期（1942年）主要通过政治局及其扩大会议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事务主义及其根源、遗毒进行深入的剖析；后期（1943—1945年）则着重讨论抗战以来中央的路线问题，同时对党历史上的重要问题作出结论。全党范围内的整风从1942年2月起，继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报告后，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全党范围的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的运动从6月全面铺开，将理论学习与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中的国共合作与斗争结合起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实际问题。

显然，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人主动革新自我的一场运动。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②延安整风不同于古田会议、八七会议和遵义会议利用数天或个别月时间进行调研和会议的方式，而是集中利用三四年时间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理论学习和教育实践，在时间上和任务上呈现了空前集中、鲜明的政治性，以及社会大众的参与性和过程的激进性等特征，形成了党内自上而下大规模的集中教育的新形态，解决了党内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可以说，这场自我革新运动彻底清理了大革命失败以来党内“左”倾、右倾错误，空前提升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分清了党内的路线是非，促进了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指导思想，为把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此后，解放战争时期的“三查三整”运动进一步清除了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和地主富农分子，贯彻了党一贯的群众路线，提升了党组织应对复杂局势的能力，为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坚实保障。

纵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内教育历程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并非天然形成，而是在革命年代加强党内马克思主义教育完成革命的组织的训练，主动净化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切实整顿党内“左”倾、右倾路线错误，淬炼了党面向自我开展革命的主动精神和路径经验，把党锻造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在实质上昭宣了党内教育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历史出场，助力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取得胜利^③。

二、党内教育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拓新发展

作为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重要途径的集中性教育创制并成为加强党的建设路径之一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固本拓新，以富于针对性的整风、整党运动和主题教育形式，密切党群关系，提升党员修养，探索制度化、常态化和长效化党内教育机制，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1. 以整风整党的教育方式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夯实党的执政基础、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④

^① 参见石仲泉：《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纪念延安整风运动70周年》，《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6期。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0页。

^③ 参见靳小勇、燕连福：《自我革命精神的理论来源、实践生成及时代意蕴》，《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年第6期。

^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6页。

群众路线作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新中国成立后重建社会秩序和发展国民经济必须坚持的路线。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的局面，毛泽东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① 相较于全面建设的宏大任务，党员领导干部管理技能的匮乏与缺失、业务素质欠缺和党性素养弱化，尤其是党员人数增加、党内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盛行，成为党面临的一大难题。

为克服党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党中央于1950年5月发出整风指示开展党内教育，整顿党内上级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下级机关中的命令主义，整顿党的干部存在的不良作风，加强党员与群众之间的联系^②。接着，全党范围内以刘少奇同志提出的共产党员具备的八项条件为标准开展整风，通过严格审查、登记，对犯有严重错误和不够条件的党员进行组织处理，结合同时期“三反”运动在党政机关中开展反腐败。通过党内系列整风整训，党员干部克服了脱离群众的倾向，对党员队伍的整肃也增强了党员干部的群众观点，以及党员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行动自觉，巩固了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夯实党执政基础的现实要求，对党内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③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提出对后者应该以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以上认识和方法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党内教育指明了方向。1957年4月起党中央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开展党内整风，虚心听取社会各界对党的批评和建议，克服党内不良倾向、密切党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将党内教育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结合起来思考的有益探索，以党内教育的方式克服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密切了党群关系，夯实了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此后，整风运动开始转向反右派斗争，基于革命年代长期阶级斗争历史形成的政治经验和惯性力量，党内教育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通过党内教育进行自我革命的机制性探索被群众政治运动取代，以党内教育为主的自我革命范式逐渐式微。

通过考察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之前的党内教育活动不难发现，通过集中化的党内教育破除党员干部思想和作风中存在的脱离人民群众的苗头，提高党员素质修养，整顿基层党组织的作风，以胜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形势和新要求，成为党的建设一以贯之的目标取向。这一时期党内教育与阶级斗争相互交织且带有强烈运动色彩，这一趋势可视为革命战争年代党建思维在和平时期的衍生与绪余。经过持续开展整风整党运动，党内的骄傲自满情绪得到克服，贪图享受、腐化堕落现象得到扭转，党组织的权威和形象得到维护，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突出的党群关系矛盾问题，是党通过自我革命以巩固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实践，成功地领导人民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重大转变。

2. 以规范化的党内教育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从严治党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是锻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核心的需要

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确立后，党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因此，坚持党的领导要求加强并改善党的领导，规范党内教育方式方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0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页。

③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4页。

法以探索制度化的党建道路，这一时期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践主要朝着两个方向发展。

其一，以纪律教育和作风建设来加强党内教育，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成立的中央纪委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拟定批准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加强党风建设。与此同时，党的队伍建设逐渐确立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作为全党选拔干部的标准。党的十二大提出“努力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后，针对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和组织不纯的问题，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提出了“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工作”的整党要求，这次整党“从中央到基层组织，自上而下、分期分批地整顿”^①。在整党伊始，邓小平强调要以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这透露出了党内教育要放弃过去大搞运动式整党的办法，更倾向于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来解决党遇到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党内思想、作风和组织严重不纯和纪律松弛的状况。此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推进，抵制盲目推崇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倾向引起党中央重视，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着重对此加以强调。1989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对党员队伍进行清查、清理以纯洁队伍。为规范党内教育，规定县处级以上党政干部凡是进入领导班子的成员，都要经过相应的党校学习，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等政治知识，并提出了制度化、经常化的要求。

其二，以党内教育提升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对党的建设的要求，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党的建设总目标，即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将“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②作为两大历史性课题。此后，围绕着党建总目标和两大历史性课题，党中央于1999年开展“三讲”教育活动以解决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2005年开展了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2008年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以及2010年的“创先争优”活动等，这些党内集中教育活动除常规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之外，还贯穿了提升全党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自觉性，提高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科学化水平，提升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的要求，初步探索并提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长效机制，构成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规范党内教育路径的重要尝试。

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规范化的党内教育是提升党的先进性和执政水平以应对各种考验、化解各种危险的重要法宝，助力于把党锻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③。

3. 以制度化、常态化的党内教育推进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同向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党的自我革命的全新方向

党的十八大后，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引领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从严治党发展至全面从严治党，极大地深化了党的建设的内涵、拓展了党的建设的广度，党的自我革命理论创新也应运而生，党内教育在全面从严治党、自我革命的理论框架下也得到了全新发展。

①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00页。

②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2页。

③ 参见习近平：《扎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求是》2012年第6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破解群众反映强烈的作风问题，党中央先后制定和落实八项规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以解决“四风”问题，尤其是突出“思想教育要结合落实制度规定来进行”，这表明新时代的党内教育并不仅仅关注于作风转变和作风改进，同时还聚焦于转作风、改作风的制度体系的完善，这既成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新方向，也为新形势下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提供了新认识和新经验。在此基础上，“三严三实”教育着力于从思想上、作风上和党性上开展党内教育，明确提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探索建立践行“三严三实”的制度机制以绷紧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专题教育融入经常性学习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则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不仅体现了党中央持续抓思想建设的决心，更彰显了步步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深入发展在2017年突出常态化、制度化，成为新时代坚持思想建党、组织建党、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典型党内教育活动。

党的十九大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战略部署，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在党的建设方面提出把制度建设贯穿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中，把党建设成为勇于自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为此，2019年、2021年相继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作为深化党的自我革命的主动实践，逐步确立机制以推进学习教育制度化、常态化。党的二十大召开后，党中央在2023年3月部署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通过“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以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

总的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党内教育推进自我革命的取向强调重视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同向并举。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在论及新时代党内集中教育时便突出强调了“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①这一鲜明特色与逻辑主线。回顾新时代以来开展的6次党内教育不难发现，高频次的党内教育彰显了党的自我革命的主动自觉性，是党在新形势下提升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居安思危之举，而6次党内学习教育活动也切实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的制度化和常态化，确保全面从严治党落地生根。作为一项长期性与系统性兼具的伟大工程，党的建设不是一两次集中教育就能够完成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集中教育强调要求把党内教育的经验、成效与日常工作相融合，其本质是把党内教育实践活动在制度化的基础上常态化、长效化。常态化的党内教育突破了单次主题教育的时限性，带有系统性、全局性和稳定性等特点，这有助于从根本上建立起制度化、规范化的党内教育体系和运作模式。可以说，常态化取向是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的良性结合，常态化的取向促使长效机制的建立成为可能，在一系列党内教育的推动下，理论学习制度、调查研究制度、激励担当机制、指导监督制度建立健全起来，深入推进了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三、党内教育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时代价值

百年来，党内教育推动中国共产党人持续自我革命，在致力于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新时代，实施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需要坚持以党内教育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把党建设成为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1页。

1. 党内教育作为淬炼党的自我革命意识、弘扬自我革命传统的主要途径，在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以推进自我革命的过程中应发挥好这一教育形式和实践载体的作用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指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①。政治上的巩固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前提，是党的生命，这就决定了党的建设必须常抓不懈，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贯穿到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百年来，党内教育的开展史，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主动建设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实践史，其中通过党内教育凝聚政治共识以维护党内团结统一是首要任务。历史和现实表明，党内教育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克服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的机会主义、冒险主义等各类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风，维护了党对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领导权，维护了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了党内的团结统一，确保了党的领导地位的巩固，使得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坚定地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伟大实践，就必须把握好党的建设与党内教育的关系。习近平在谈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时不止一次强调，要“勇于自我革命”“敢于自我革命”，“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推进改革”“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刀刃向内、刮骨疗伤、壮士断腕”来传达推进自我革命的必要性、坚决性和彻底性。显然，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党内教育培育和弘扬自我革命的精神，要坚持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更好坚定党的建设这一根本方向^②。作为开展思想建设、锻造自我革命精神的主要途径，党内教育不仅仅是经验，更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切实有效的途径。只有利用好这一方式，方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③。因此，新时代应该继续探索以党内教育推进党的建设的有效途径，把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进行下去。

2. 党内教育须坚持制度化、常态化和长效化的取向，建立和健全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为推进自我革命提供切实保障

百年来党内教育的发展，经历了运动式、集中化、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和制度化等形式，是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维护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而不断拓新发展的历程。百年来党内教育探索实践表明，只有建立制度化、常态化和长效化的党内教育，不断健全党的自我革命的制度规范体系，方能持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马克思在1847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制定《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时，即确立了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民主制度等基本组织制度，充分体现了制度及其运转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构建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党的十八大后党的建设重要的理论创新，是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中形成发展起来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包括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规范体系，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度，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的体制机制，八项规定精神常态化机制，党内法规体系，以及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等一系列规范。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确立和完善，使党的自我革命不仅有规可循，而且为常态化、长效化自我革命提供了制度保障、机制保障。要深化贯彻落实这一系列规范体系，就必须以党内教育来增进全体党员对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必要性、重要性和坚定性的科学认知，例如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开展2年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2页。

② 参见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求是》2023年第3期。

③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70-71页。

终身课题，形成长效机制，作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一部分。同样，在2021年伊始的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指出，在全国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在党史学习教育总结大会上，习近平要求建立常态化、长效化的制度机制，不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这表明，党内教育的开展和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的探索，是提升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必由之路。

3. 以党内教育推进伟大自我革命的根本政治目的在于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社会革命的定义表明，社会革命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不仅仅是一种破除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运动，更是一种新的社会建设运动^①。换言之，社会革命不仅是为了破坏旧的生产关系，更是为了建立、保护与发展新的生产关系。因此，唯物史观中“社会革命”指向的是社会制度根本变革和社会形态的更替，而非传统史学中革命所指的简单的政权更迭，这就意味着社会革命必然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

从这一角度审视建党百年来的历史不难发现，党内教育的创制、发展、出场和拓新，是中国共产党人持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的历史，究其实质，则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史。百年来党内教育锻造了敢于善于斗争、勇于自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持续推进社会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建立并巩固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and 经济制度，通过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②。

新时代以来开展的6次党内教育贯穿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主线，推动了全党在思想上统一、政治上团结、作风上务实和行动上一致，助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在新时代十年取得历史性变革成效后，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只有不断以党内教育持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方能推动社会革命持续向前，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
- [2]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
- [3]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求是》2023年第3期。

（编辑：梅 岚）

^① 参见徐光春：《伟大的社会革命与伟大的自我革命》，《求是》2018年第7期。

^② 参见习近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求是》2022年第18期。